

耳旁的风

安黎新编散文集

安黎

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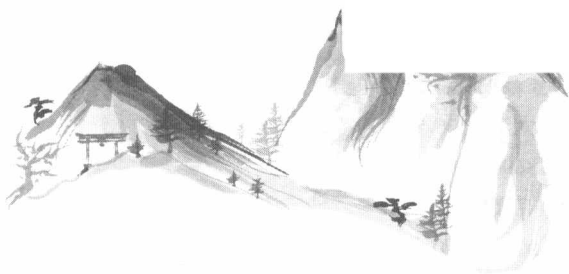


耳旁的风

安黎新编散文集

安黎

著



漓江出版社
桂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耳旁的风:安黎新编散文集/安黎 著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16. 10
ISBN 978-7-5407-7914-6

I. ①耳… II. ①安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218764 号

组 稿:周向荣

责任编辑:谢 阅

装帧设计:何 萌

出版人:刘迪才

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

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政编码:541002

网址:<http://www.lijiangbook.com>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销售热线:021-55089658-8020

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(山东省德州市经济开发区晶华大道 2306 号 邮政编码:253000)

开本:960mm×690mm 1/16

印张:19.75 字数:230 千字

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39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0539-2925888)

目 录

关垵子 / 1

历史的物证 / 14

——西安城墙漫笔

官之庄 / 21

民之学 / 26

人之墓 / 35

附录一:稿边笔记(穆涛) / 44

附录二:被湮没的历史与记忆(杨辉) / 46

西风落叶下长安 / 50

树木,或者山峦 / 56

——追寻鸠摩罗什的足迹

一个人远去的背影 / 61

——一个县委书记的人生片段

一个老实人的生与死 / 80

台湾的净 / 99

台湾的静 / 104

台湾的里子和面子 / 109

旁观“五都选举” / 114

路过汶川 / 118

走进金川 / 121

观音庙与情人湖 / 124

碉与御碑 / 128

藏族歌舞 / 132

那座小岛 / 136

贾平凹擀面 / 142

陈忠实的“大” / 146

雪燕老师,您还好吗 / 154

崇高,看起来是那么平凡 / 164

——追忆李尤白先生

两个言称自己要获“诺贝尔文学奖”的人 / 168

三位令我感动的读者 / 174

开不起的“玩笑” / 181

——我说《玩笑》

小题材,大主题 / 195

——伊朗电影《小鞋子》观后感

《小人物》背后的小人物 / 200

答陈文伍先生问 / 216

有关《时间的面孔》的问答 / 226

吴先生的电话 / 233

当一个读者 / 238

儿子的成长地图 / 242

暮色里的街道 / 253

城墙下的理发师 / 255

另类的免费午餐 / 257

平庸的幸福 / 259

二分钱的谎言 / 261

虚幻的满足 / 264

发泄与嘲讽 / 267

宾馆里的春节 / 271

为何“不好好劳动” / 278

如此“贵族” / 280

钱可以杀人 / 282

站直,中国精神之期待 / 284

善很柔软,但有力量 / 289

修复公众的“心理公平” / 291

喜欢与不喜欢 / 294

——与朋友的聊天笔记

胡思乱想 / 298

阿 Q 精神 / 302

浪费时间 / 305

关垭子

1

一道厚厚长长的石墙，随山势的起伏而起伏，逶迤伸向遥远的天际。

经历两千多年的风剥雨蚀，这道巍然森然的长墙，已化为了残垣断壁，被恣肆的荒草所淹没。长墙阻挡过呼啸而至的千军万马，但如今，却抵挡不了农夫脚掌的随意踩踏。耕种者、砍柴者、采药者，不论老少，不论男女，都能从它匍匐于地的消瘦脊梁上轻易跨过。

时间埋葬了多少物事，却没能将一段成形于战国时期的长墙，彻底吞噬。

应验了《三国演义》开端的那句话，中国的历史很难逃出“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”的宿命轮回。就像一块布单，时而被人用剪刀裁开，时而被人用针线缝合，如此反复，看起来还算完整的布单，其实早已成了拼凑物。不过，借用民间的话语，亲兄弟即使“打断骨头也连着筋”，分分合合，合合分分，中华版图始终没有分崩离析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。

坐落于陕西省南端的平利县长安镇的一道长墙，一道关口，见证了一段遥远的历史。这段历史，现在解读起来，依然能隐隐透出其浓郁的血腥味。当地处渭河流域的秦国，在野心的驱使下，精兵习武，日益强壮之时，沉湎于作词吟赋的楚国，却在米酒的作用下，呈现出了神思恍惚之态。武夫与书生的较量，砖石与笔杆子的磕碰，暂时获胜的，无疑皆是前者。但天外有天，人上有人，比砖石更为坚硬的大有其物，比如榔头与铁锤。强大的秦国虽然觊觎着比自己体格瘦小的楚国，却难以做到高枕无忧。秦国贪得无厌，虎视眈眈，然而目光却不能专注于前

方,对身后之患不管不顾。秦国欲吞并六国,须心无旁骛,不能腹背同时受敌。于是在出征六国之前,秦国急需解决的心头之患,就是阻止塞外游牧兵马的滋扰。游牧部落本是马背上的民族,他们凭借着凛冽铁蹄与莽夫之勇,屡屡越过边界冒犯秦国,令秦国朝野为之深深皱眉。秦国的箭矢,无法抗衡从北方呼啸而来的明晃晃的马刀,便想出了一个笨招,那就是构筑一道长墙,将自己和游牧部落予以隔绝。于是,在华夏的大地上,就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长的一道墙。这道墙,经历朝历代的反复夯土加砖,不但无比绵长,而且异常坚固。长墙的名字叫长城,但实际上,长城名不副实,因为它唯有墙,没有城。

铺垫长城根基的,是层叠的尸骨;凝结长城砖缝的,是无数的泪滴。多少个孟姜女滴血的哭声,在岁月的荒野里飘荡;多少个肝肠寸断的寡妇,死在了寻夫的路途。一项被后人视为杰作的浩大工程,掩盖了多少幕人间悲戏。

门的功能是畅通,墙的功能是阻隔。幻想着用墙来阻隔强敌的侵袭,哪怕在冷兵器时代,也只是缓兵之计。秦国开创了造墙的历史,在当时没有被当作笑柄,却被视为安邦之良策,被其他国家纷纷仿效。当秦国的苦役们在长鞭的脆响中扛着石头汗流浹背时,楚国的劳工也被驱赶向秦楚的边境地带,垫土打夯,背砖扛石,开始了一道千里之墙的修筑。秦国视楚国为盘中餐,楚国视秦国为中山狼。秦国修长城是为了防范游牧匈奴,而楚国筑长城是为了抵挡秦国。弱肉强食的生物链条,在国与国的政治角逐中,跃然毕现。

楚国是书香之地,早在春秋时期,楚文化的轮廓已经显现。楚文化孕育了诗界巨子屈原,同时也为其提供了相当宽松的生长环境和表达环境。悲观主义的诗人,哀叹不息,对时政冷嘲热讽,却依然能获得楚王的青睐与民众的爱戴。楚国亡国之际,屈原投江自尽,用生命的背影给世间留下了最后一曲绝唱。这等以身殉国的壮烈,非心血来潮,也非出于诗人多愁善感的天性,而是因爱而滋生的深刻绝望。诗人发自肺腑地热爱着楚国,热爱着楚王,热爱着楚文化,当他清醒地意识到这些都因秦国的蛮横统统化为乌有时,心灵深处的痛楚,可想而知。按照现在的标准,完全可以给屈原戴一顶反对国家统一的帽子。但奇特之处在于,千百年来,人们总是把屈原当作爱国的典范来讴歌和敬奉。屈原的确爱国,但他爱的只是时为周王朝分封的诸侯国楚国,对行将就木的周王朝,未必那么忠心耿耿。秦朝崛起于周礼的诞生地,却弃仁义而择武力,企图靠淫威来号令天下。相

比之下,楚国受周礼的熏陶更为彻底,楚文化其实就是从周文化之树上长出的一根枝条,这根枝条,其浓浓之荫,给树下的乘凉者,营造出了一片适宜于呼吸的小环境。小环境哺育出了大诗人,大诗人羔羊跪乳,他对这片小环境的情感,血浓于水。屈原独爱楚国,是因为楚国允许他发牢骚,允许他畅所欲言。楚国不禁言,不封口,这大概是屈原对楚国情有独钟的原因。屈原投河,是对暴政的抗议。他用自己特有的方式,注解着西方思想家的话语:哪里有自由,哪里就是我的祖国。

2

如果说长城曾经是中国的国界线,那么楚长城则是秦楚两地的分界线。

曾经的中国,像一张完整的纸张那样,很辽阔,亦很脆弱,经不起一阵狂风卷过。只要有一个野心家揭竿而起,就会有无数个野心家遥相呼应。野心唤醒野心,蛮横激活蛮横,在拼杀之中,那张纸便被刀戟划破戳烂,不复完整。一个暮气沉沉的朝廷倒塌,无数个朝廷犹如春笋,破土而出。恍惚间,遍地皆国家,遍地皆国王。诸多莽夫流寇野心膨胀,纷纷占山为王,自我加冕,各自为政,相互为敌,你争我夺,都以消灭对方为己任,从而使自己从一介布衣,扶正为独一无二的真命天子。在混战中,除了武力的角逐,还有计谋的较量。计谋的身上,常常披着一件智慧的外衣,但它全然不等于智慧。计谋中确实包含着智慧,但其立足点与出发点,就决定了它是对智慧的背叛。智慧的目的,在于成全,在于构筑,而计谋的侧重点在于损毁,在于拆台。在相当程度上,计谋是伎俩的孪生姐妹,它具有损人利己的特质。智慧是亮光,计谋是阴影。计谋是躲在角落里的磨牙与掐算,它以出其不意的招数,陷他人于困境,以此来满足自己的私欲。

春秋战国时期,出现了许多所谓的谋士。有些谋士,比如蔡泽、苏秦、张仪等人,因搅动三寸不烂之舌有功,竟躺进了历史的典籍。谋士又被称为说客,也就是说,他们是一群靠磨嘴皮子为生的人。谋士们不是大臣,用现在的话说,那就是非体制内人士,属于沦落于草莽之中的落魄的读书人。不在其位,却谋其政,他们的角色异常尴尬。有需求,才有供给。在非常时期,君主们的人才意识常常比任何时候都强烈。他们视谋士一职,不可或缺,于是不惜花费巨资,招募天下

贤能之人,并把这些吊着书袋且夸夸其谈的闲人供养起来。闲人不闲,闲的是手脚,不闲的是大脑与嘴巴。在那个年代,君主们能意识到务虚的重要性,实属不易。在实用主义流行的当下,回眸并遥望那时的君主,令人无不感慨连连。有了君主的召唤,那些百无一用的书生,突然就吃香起来。那些满腹经纶者东奔西走,那些腹内空空者同样也耐不住寂寞,于是乎,在历史的舞台上,演绎出了精彩纷呈的戏剧,各色人等,各种生旦净末丑,都轮番登台亮相,并使出浑身解数,推销自己,也推销自己的治国方略。谋士们并不忠诚,尽管他们高叫着“士为知己者死”,但要寻找到知己,不比寻找到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容易。他们今天投靠这个主子,明天投靠那个主子,今天要辅助的人,很有可能就是明天谋划着要消灭的那个人。谁给饭吃,就效力于谁。一旦银两装进口袋,唇齿间便像抹了润滑油,滔滔不绝,唾沫星四溅,既为主子出谋划策,又冒着生命危险并来回回地挑拨离间。谋士们所出的点子,有一些确实是治病的良药,然而,即使是良药,却未必真能治病,因为处方权并不握在谋士们的手里。主子采纳了配方,良药才能生效。更多的点子,其实都是一些旁门左道,甚至就是藏有祸心阴招的鬼点子。说一千道一万,谋士们喋喋不休的,与道德无关,与正义无涉,大多含有“不论白猫黑猫,逮住老鼠就是好猫”的意味。

孙武虽为一介武夫,却能文能武。他在带兵打仗之余,还枯坐孤灯之下,挥毫写出了著名的《孙子兵法》。《孙子兵法》的问世,与谋士盛行的环境密不可分。诸多的谋士,只是通过言词,把自己的一己之见传递给了君主,而孙武,比起他们,显然要技高一筹。他不但把自己的主张奏于圣上,还把自己的用兵之道,予以归纳和整理,写在纸上,刻在石上,期待这些兵法能成为在往后的战场上屡试不爽的灵丹妙药。然而,“孙子兵法”,说穿了,就是“孙子骗法”,因为它满篇谈论的,都是用兵的计策计谋。这些计策计谋,重点不在于“策”,而在于“计”和“谋”,即所谓的阴谋诡计。诡计多端,诡计多变,大多带有迷惑对手的色彩,充满了欺诈的意图。尽管孙子为自己开脱说“兵不厌诈”,然而,即使是在用兵上,如果“诈”被滥用,屡施骗术,还是容易让人联想到生活中居心叵测的奸污小人。依靠骗术取胜,不论怎样自我粉饰,都显得不那么君子,不那么光彩。

楚国在南,秦国在北,一个盘踞于汉江中下游,一个雄霸于渭河流域和汉江上游。对于楚国来说,没有哪个国家比秦国更具威胁了。为防范秦国的侵犯,楚

国不得不以敌为师,以子之矛攻子之盾,借秦国构筑长城的办法来抗拒秦国。于是,在秦楚的边界线上,就耸立起了一道无比悠长的高墙。

高墙终究未能挽救楚国的命运。当然,灭掉楚国以及其他五国的秦国,也未能逃脱被后继者灭掉的厄运。华夏的历史,其实就是一个消灭与被消灭的循环史。

3

秦朝灭亡了,秦长城还在;楚国灭亡了,楚长城还在。

长城,是承载中华皇权最为形象的符号,是解读皇权秘籍最佳的参照物。表象上的雄霸、壮观、不可一世,却遮掩不了内心的纠结、战栗与虚空。

2014年8月中旬,我来到了秦国的东南边界,见到了这座楚长城的残迹。

这个地名叫关垭子。顾名思义,关垭子就是一个关口,它是秦国通往楚国,或楚国通往秦国的通道。秦楚之间,千山耸立,百峰峥嵘,在层峦叠嶂间,山峰错列而形成的峡口,少之又少。楚国与秦国的恩怨,早已化为了史料中一个小小的片段,一段像神话那般虚无缥缈的描述,但作为两个国家交往或纷争见证者的关垭子,却始终存在于那里。关垭子的寿命,比秦国长,比楚国长,比汉朝长,比唐朝长,比宋元明清都要长。关垭子上飘拂的大王旗,颜色在变,图案在变,但关垭子却始终未变。

而今,关垭子的这边是陕西省的平利县,那边是湖北省的竹溪县。那条两千年前楚国劳工修建的楚长城,在关垭子之处清晰可见。关垭子处于两座山脉的夹缝之处,比起周边的地势,它低洼了许多。两座庞大的山脉,各自挺着一个大肚子,相互对峙着,似乎要进行一场相扑比赛。就在它们的身体即将碰撞之时,裁判却猛然喊了一声停,惯于听从命令服从指挥的它们,各自收缩了身体,在半山之中,留出了一道窄窄的缝隙。两座大山的礼让,使山与山终究没有合拢,也总算没有将路径堵死,从而在秦楚之间,造就出了一道“一夫当关万夫莫开”的逼仄关口。

关口处,高高耸立着一座城楼。打眼一瞧,城楼就是典型的军事设施,它的主要用途,不外乎两项内容:一是瞭望哨所,一是用于驻扎守护边界的将士。城

楼不是山巅,但它是峡谷地带的高地,一旦有敌方人员蠢蠢欲动,坚守于城垛之上的哨兵,或敲锣,或吹牛角,向匍匐于山林深处的将士发出警讯。攻击的一方要越过边界,必须占领城楼。于是可以想见,城楼里外,时不时就狼烟四起。双方的兵士手持利刃和剑戟,拼杀得天昏地暗。许许多多年轻的脑袋,像西瓜一般在坡路上滚落;许许多多稚嫩的皮肤,纵横着一道道长长短短的刀伤。鲜血染红了山石,尸体填平了沟壑。

战争给许多幸存者带来了实惠,他们被封官加爵,踩着人头铺就的台阶爬上高位。与此同时,战争也极大地丰富了汉语的词库。有一个成语,叫“朝秦暮楚”,讲的正是关垭子一带民众的遭遇。可以想象,当旌旗摇曳,鼓角齐鸣,刀戟的碰撞声和惨痛的号叫声混响成一片时,居住在关垭子一带的民众,会有多么地惊慌。持久的拉锯战,早把他们变成了惊弓之鸟。自己的家园,早上被秦军占领,成了秦国的领土;下午又被楚国夺去,成了楚国的一部分;今天他们是秦国的臣民,一觉醒来,明天就又转换成了楚国的臣民。在秦楚两位主角的交替轮回中,战战兢兢的民众,谁也得罪不起,他们唯一能做的,就是明哲保身。怎样才能保住性命,不至于使自己沦为刺刀之下的祭品呢?聪明的民众摸索出了一套逃避牺牲的办法,那就是预备两副面孔,预备两套服装,预备两面旗子。秦军打来了,他们就冲着秦军媚笑,并在屋顶插上秦军的旗子,穿上秦人的衣服;楚军打来了,他们又冲着楚军点头哈腰,插上楚军的旗子,穿上楚人的衣服。

占领军每夺取一个地方,很在意民众是否愿意归顺自己。归顺者可以饶其一命,不归顺者立刻遭到斩首。不能责怪老百姓是变色龙,他们见风使舵,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,仅仅是为了苟且偷生。

战争是杀人的游戏。谁杀得多,谁就战功卓著,谁的胸前就佩戴镀金的勋章。从政权的角度,给在战场上英勇杀敌的人以赏赐,以礼赞,似乎理所当然。但从人性的角度,却显得很残忍。人受之于上帝的造化,并不是为杀人或被杀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。每一个人,都是血肉之躯,都是父母的心肝宝贝。随意剥夺一个无辜者的性命,无论如何,都显得不仁不义,既逆背了天意,也违反了人伦。

读《三国演义》,常常会看到“屠五万”之类一笔带过的简约式叙述。这样的句子,无比冰冷,却使我大为震撼。我惊讶的,除了生命大批量的肝脑涂地,更有作者面对生命凋敝时的漠然态度。作者的语调是冷漠的,是无所谓的,甚至是幸

灾乐祸的。那么多活生生的人瞬间死亡,在施耐庵的心里无足轻重,以至于他都不肯浪费两滴墨汁,多写几笔。施耐庵不是一个讲究异化和变形的现代主义作家,他不是以嬉皮笑脸的方式来写悲剧的。他热衷于渲染格斗的热闹,渲染杀人狂的“英雄气概”,却对生命表现出了彻骨的冰冷。这种冰冷,除了受制于时代的局限,也与他的价值取向和做人境界休戚相关。当皇帝无比伟大时,草民必然是渺小的;当圣上的龙体无比金贵时,草民必然是贱若草芥的;当草民跪地山呼万岁时,“君叫臣死,臣不得不死”必然大行其道。

相比之下,唐时的医学家孙思邈,不论是在认知上,还是在做人的情怀上,都要比施耐庵高出许多。孙思邈不但是一位彻底的人道主义者,而且在那样一个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”的等级社会里,很是另类,显现出人人人生而平等的觉悟和意识。这样的平等意识,即使是在千年之后的今天,依然能让我们为之感动和仰望。

战争是人性之恶的大释放。比起战争的狰狞,和平的面孔是那样地慈祥与可爱。

4

分裂的六国好,还是秦国的大一统好?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,并会得出截然相左的结论。

秦楚争霸时期的谋士,四处游说,他们阐述的角度虽然各有侧重,所举的例证“百花齐放”,但总体观点却大体趋向一致,那就是要以仁义之心治理国家,要施行仁政而摒弃暴政。施行仁政的出发点,并非真心为老百姓好,只是为了笼络人心,收买人心,以期延长朝廷存活的寿命。先贤孟子更是孜孜不倦,苦口婆心,反复劝诫统治者要“爱民如子”,把子民置于社稷与圣君之前。

纵观中国五千年的历史,就会发现,差不多每一个王朝在夺取政权时,都威猛如虎,但政权一经建立,马上就像川戏中的变脸那样,更换了一张新面孔。恶煞不见了,取而代之的是柔和的面容。这样的面容,似乎有几分伪善,但伪装的善,至少还能意识到善的重要,总比赤裸裸的恶要好一些。

旧人已去,新人登基。旧人哭,新人笑,这是长演不衰的历史剧情。那些登

上历史舞台的新主演,不见得人人都是智者。然而,即使是那些昏君,脚跟刚刚站稳之际,都会听从谋士的劝告,在政权初期,实行养民生息的仁政,实行天下和解的策略,轻赋减税,大赦天下,极力避免苛政,避免暴政,避免镇压,避免穷追不舍,避免没收私有财产,以笼络天下失散的人心,以弥合因过度使用武力而给族群和个人带来的撕裂。

一个把人当人的国家,才是好国家;一个把人当人的社会,才是好社会。从生理的意义上,人与人或有不同;但从社会的意义上,每个人,不论老幼,不论男女,不论身体差异,不论财富多寡,不论职业高低,其人格都是平等的,都应享有尊严和尊重。

站立在关垭子的拱式城门里,不再担心楚兵的追击,也不用提防秦兵的突袭。城门豁然洞开,人可以坐在城门洞里打盹,也可以在城门洞里自由溜达。门洞没有闭合的门扇,没有荷枪实弹的士兵,唯有一股股带有青草味的清风,从门洞的这边或那边,穿堂而过,忽悠而来,忽悠而去。城楼两边的民居,相距不过二三百米,据说,他们非常熟悉,见了面,操持着相近的口音,彼此打着招呼,拉着家常,且相互嫁娶。两千年前,他们的祖先也许就在关垭子一带殊死拼杀过,但今天,他们却是你中有我,我中有你,血脉已模糊得难以缕析。谁也不敢拍着胸膛说我就是地地道道的秦人,谁不也敢信誓旦旦地以楚人自居。城门失火,殃及池鱼,每一场战乱所带来的衍生品,就是那些望不见首尾的逃难队伍。那些慌慌张张的迁徙者,并不清楚自己的落脚点在哪里,只是想着赶快逃离战火,远离是非之地,以求得自己和家人生命不被剥夺。至于叶落何处,只有听天由命了。于是乎,现在的北方人中,有相当大的一部分,其故乡在长江以南;现在的南方人中,其祖籍大都为黄河流域。北方人与南方人从体格与性格上体现出的差异性,不在于生命的基因,而在于水土的悬殊,正所谓“桔生淮南则为桔,生于淮北则为枳”。关垭子两旁的湖北人和陕西人,其来往的频繁与密切,足以用水乳交融来形容,但纵然这样,由于行政管辖权的不同,他们精神的指向却呈现着南辕北辙的景象:一方倒向湖北,另一方偏向陕西。对于这里的湖北人来说,遥远的武汉,才是他们趋之若鹜的中心;而这里一辈辈的陕西人,大概不断吟咏着辛弃疾曾经的感叹:“西北望长安,可怜无数山。”

长安既远在天边,又近在眼前。

周秦汉唐的都城长安隐身于绵延不绝的山后。山是那样地高耸,是那样地无边无际。山的后面是山,山的前面是山,山的右面是山,山的左面还是山。山外的那个长安城够不着了,可山内的这个长安镇就在脚下,就在坡下。从关垭子去长安镇,步行不过两千余步,耗时最多一千六百秒。

楚长城修建了三百余年。

这样的时间跨度,恐怕要超过愚公家族的“挖山不止”。愚公说,他挖山,他儿子挖山,孙子也挖山,世世代代地挖下去,王屋山和太行山总有挖通的那一天。

如果修建楚长城是一个家族必须承担的义务,那么,这个家族的数十代人,必然陷入修建长城的苦役中无法自拔。爷爷的一辈子,儿子的一辈子,孙子的一辈子,重孙的一辈子……都是在修建长城中度过的,这样的人生,何其繁重,何其乏味!当一个人尚未出世,其命运的刑期已被宣判,活着如同服刑,又何其可悲可叹!一道长长的墙,仿佛一根粗粗的铁链,捆住了数以百万计人的手脚,使他们沦为伺候自己的奴隶。可以想见,在生产力极其原始的状态下,每一块石头从山体中取出,经过切割与打磨,又搬又抬地挪至这里,得磨破多少只手掌,压肿多少个肩膀?而一道长达三千里的厚墙,需要垒砌多少块山石,才能逶迤于山巅,耸立于荒野?在人与石头的较量中,人是多么地不堪一击。在修建长城中,究竟有多少人被砸伤踏伤,有多少人命丧工地,谁也无法说清。那些伤者亡者,因身份卑微,史官不会斜瞥他们一眼,于是他们便像被狂风吹起的沙尘,消失在了岁月的黑洞里。

楚长城东起河南泌阳,西抵重庆奉节,跨越千山万水,途径豫、陕、渝等地,“宜石则垒,宜土则筑,宜水则堤,要塞必城堡”。《左传》描写楚国是“汉水以为池,方城以为城”,其中的方城,指的就是楚长城。按照《左传》的解释,汉水拘泥于楚国之内,它仿佛楚国境内的一座水池,而楚国又拘囿于长城之内,长城不过是楚国的院墙,让楚国从心理上获得了些许的安全感。然而,如同锁子只能锁住君子却难以锁住小人那样,长城的修建,只是增加了秦国攻击楚国的难度,并不会改变整个战局的走向。后来的事实,无疑证明了这一点。

走近关垭子，一座城楼横在关口。城楼两侧，沿着渐渐升高的山脊，长城蜿蜒而上。据说，气贯长虹的楚长城，在绝大部分地段，已踪迹全无，唯有在这里，它才留下了自己的蛛丝马迹，留下了能证实自己真实存在的一抹孤影。

山坡披头散发。一棵棵落叶松，身杆挺拔笔直，它们是山坡的王者。树梢之上，云雾飘忽缭绕。树下是野生的灌木林，蓬蓬勃勃，枝枝蔓蔓，如绿色的游蛇，笼罩着落叶松的脚趾，缠绕着落叶松的小腿。竹叶草开着蓝盈盈的小花，野棉花绽放着黄灿灿的花瓣，野生的枣树上，圆鼓鼓的小枣在风中抖颤，或红或绿。有一种俗名霍麻的植物，据说它体内含毒，人得离它远远的，不可靠近。人一触碰它，皮肤就会红肿，且疼痛难忍。

羞羞怯怯的植物，为什么会体内藏毒？我猜想，其原因与楚国修建长城相类似，无非为了自保。在楚国眼里，秦国怀有狼子野心；在霍麻的眼里，人也心怀歹意。柔弱的霍麻，为了不使自己成为牛羊嘴里的美食，为了不使自己被利刃割掉脑袋从而化为炉灶里的一缕烟火，只好在枝叶上释放出毒液，以拒绝人的靠近，以保全自身的性命。弱小者抵御不了强大者的侵袭，只能采取旁门左道的方式来捍卫自己。蝎子携着带毒的刺，蛇携着带毒的牙，其动机大概与霍麻无异。

泼妇是人群中有毒的蝎子，很令人生厌。但若冷静仔细地打量她们，就会发现她们其实是社会里的弱势人群。泼妇滋生于社会底层，繁衍于社会底层，她们因屡屡受辱，便或轻或重地患上了迫害妄想症，总以为别人都想加害于她，于是化消极为积极，以蛮不讲理的彪悍，以拔剑弩张的强势，以死搅蛮缠的无赖姿态，来抵御外在的伤害。权力的拥有者可以用权力保护自己，金钱的持有者可以用金钱化解靠近自己的危险，无权无钱的泼妇无所依偎，只能用唾沫和牙齿来自卫。

楚长城的砖石已经掉落，内瓤赤裸裸地暴晒在阳光下，乍一看，它很像一道土坎。摸一摸墙体，发觉它坚实无比，其硬度俨然超过了凝固的混凝土。水泥是西方人的发明，石灰石是中国人的创造，但战国时期，石灰石是否已用于建筑，因未查阅资料，我暂且不知。我所知道的是，眼前的楚长城，似乎与石灰石毫不搭界。石灰石用于墙体，会留下一道道的白印，但楚长城的墙体上，却一抹土黄色，别无其他颜色。建造某项工程，今人有今人的办法，古人也有古人的妙招。当某一项建筑材料尚未诞生之时，一定有它的替代物。层叠的鹳雀楼，绮丽的阿房

宫,挺拔的大雁塔,以及林林总总的长城和城墙等,均出自于古人之手,但在当时,中国人于水泥二字,尚闻所未闻。

楚长城无比结实,粘连其墙体的是糯米。把糯米捣碎,用水浸泡,来来回回地搅匀,使糯米变成粘稠的糊状物。将糊状物拌进细碎的沙石中,风干之后,沙石便会板结得牢不可破。无数颗小小的糯米,就这样从食品变成了建筑材料,从而支撑起了这么一道横亘千里的长城。

站在楚长城之巅,极目而望,远处是隆起的群山,近处是排排房舍。尽管只有一个关口之隔,但关里关外,房舍的风格却大为相异。湖北境内的房屋,多是灰墙红瓦,而陕西境内的建筑,却是一袭徽派样式。白色的墙壁,白色的屋檐,辅之以灰色的琉璃瓦,在汹涌的绿涛之中,它们与黛色的山脉,潺潺的溪流,共同组合成了一幅美轮美奂的画面。

平利自古就是秦国的边界。从行政区划上,平利属于北方,但从地理构成上,它却属于南方。从山川到气候,从建筑到饮食,从习俗到语言,平利都与北方不搭界。北方的粗犷,北方的辽阔,北方的平铺直叙,都与平利形成了显著的落差。平利是柔媚的,是婉约的,是细腻的,它更像是一个眉目含羞的闺秀,而不是高喉咙大嗓门的农家大姐。

6

距离平利县城最近的镇,叫长安镇。

关垭子耸立于长安镇的边缘,长安镇坐落于关垭子的身旁。站在关垭子的城墙上,长安镇的风貌一览无余。

世间叫长安的地方很多,唯汉唐的都城最有名。

此长安,非彼长安;小长安,非大长安。比起汉唐都城的臃肿和虚荣来,这座偏居一隅的小镇,显得格外素雅和寂寞。我之所以对长安镇情有独钟,恰恰在于它的素面朝天,它的孤寂冷清。热闹有热闹的局限,冷清有清冷的优长。当商业的叫卖声喧嚣声无处不在时,当挖掘机无所顾忌地啃食大地的一片片肌肤时,当铺天盖地的脂粉气息让面孔和山河同时失真时,一种被冷落的孤独,一种被遗忘的冷清,一种原封不动的真实,一种未经雕琢的原始,才是我心之所往,梦之所